

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

——悼念玛拉沁夫先生

蔡测海



玛拉沁夫。（资料照片）

编者按

中国作家协会原党组书记、书记处常务书记，第八、九届全国政协委员，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主席团委员，著名作家、剧作家、编辑出版家玛拉沁夫同志，因病医治无效，于2026年9月1日17时32分在北京逝世，享年97岁。

玛拉沁夫是蒙古族作家，牵头创办《民族文学》《草原》等杂志。他积极推动创立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、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工作机制，曾主持中国作协工作，为中国文学事业繁荣发展作出重要贡献。

他著有短篇《科尔沁草原的人们》、长篇《茫茫的草原》、短篇小说集《花的草原》、电影剧本《草原晨曲》《沙漠的春天》《祖国啊，母亲》、歌词《敕勒相会》《草原晨曲》等一批经典作品，出版《玛拉沁夫文集》（八卷）。他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、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、中国文联终身成就电影艺术家等。他生前曾感叹：“广袤的草原是我创作灵感的源泉，是我一生情感的寄托。我的精神故乡就是那片草原和生活在上面的人民……”

2026年，9月1日，17时32分，我文学生涯中的重要人物玛拉沁夫先生辞世，离开了我，离开了我们。

这一刻，我一个人，在故乡的一棵板栗树下的石头上坐着，直到月亮升起。这一刻，燕山山脉的月亮，内蒙古大草原的月亮，和我的家乡武陵山的月亮一样皎洁，皓月清辉，洒满人间。60多年前，也是秋天，我坐在一棵板栗树下的石头上，读玛拉沁夫先生的书，书名《花的草原》，那年我12岁，小学五年级。

写月亮唱月亮的人走了。想起每次豪饮之后，他会颌首放歌：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。壮士豪情，青春回响。斯人已去，再不能与你促膝，再不能同你放声歌唱，真的是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

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一张合影，背景是大海，照片前排正中是玛拉沁夫先生，周围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中青年作家。有新疆来的叶尔克西，西藏来的扎西达娃，四川来的吉狄马加，还有北京的赵大年，湖北的李传锋，湖南是我和颜家文。张承志和乌热尔图不见，也没有阿来。那时候玛拉沁夫先生是《民族文学》主编。他写信给茅盾，周扬，丁玲几位文艺界的领导，创办了《民族文学》，不久，他又创立了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，繁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，培养一批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。以各少数民族文学为载体，积极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。无论是作为著名作家，作为刊物主编，还是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者之一，他始终坚持少数民族文学的正确发展方向。

玛拉沁夫先生多次对我讲，少数民族青年作家，相对汉民族作家而言，起点低，要刻苦，多努力。别人用一分力，你要用十分力。你们要站在中国最优秀的作家队列里。他赞扬张承志，也表扬了我和扎西达娃。让我很受鼓舞。至今，我听到《你鼓舞了我》这首歌，仍感动不已。在玛拉沁夫86岁生日那天，我在微信里把这支歌转送给他。

玛拉沁夫先生是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介绍人之一，另一位是蒙古族作家特·赛音巴雅尔老师。一次，玛拉沁夫先生问我是不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我说不是。他又问，省里没推荐？我说，我也不是省作家协会会员。

他说：你已获三次全国文学大奖，怎么能不是作家协会会员呢？我说：我获奖太快，人会就慢了一点。他帮我领了会员申请表，让我填好交给他，他和特·赛音巴雅尔老师在介绍人一栏签了名。后来，我很快被批准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我是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，后加入湖南省作家协会。

与玛拉沁夫先生还有一次历险。那次，在延边评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，评完奖，所有评委去长白山看天池。我与吉狄马加和玛拉沁夫先生同乘一辆轿车。那天难得的好天气，天池很蓝。下山时，轿车掉了个后轮，坡陡，雪多，掉了一个车轮居然没翻车。有惊无险。玛拉沁夫先生云淡风轻，他当过八路军，经历过千难万险。只是说：“你们两个年轻，出了事，我怎么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交代？”

后来，多次见面，是在虎坊桥那边，在他家里。多次促膝长谈。他爱喝我家乡的黄金茶。他说他收集了许多资料，做了许多笔记，准备写一部多卷本长篇小说。他又说，赵树理是最具现代意识的开拓性的大作家，语言大师。他说年轻时参加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，周恩来总理和他单独谈话。

玛拉沁夫先生，是一位好老师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开拓者和建设者，也是一位有强烈使命感的作家和文学事业领导者。

玛拉沁夫先生也对我有过几次严肃也还算温和的批评。一次是烟台笔会，他让我发言，我就即兴发言。我讲，文学有一样的审美标准，不会是土家族文学有一个审美标准，苗族文学又是一个审美标准，汉族文学又是一个审美标准。先生听了，不太高兴，批评了几句。还有一次是因为我的一篇小说。他批评说你也搞寻根那一套，出息不大。另一次是骏马奖评奖，对一位作家的一部作品评价，我同大多数评委意见不同，还当面顶撞先生，那一次，先生对我的话讲得很重。吃饭时，我给先生敬酒，他一饮而尽。他拍了我的肩膀说：“小伙子，你有想法，自己慢慢想。我还是玛老师，你还是小蔡。”

先生，你走了。再不能与你促膝。月有阴晴圆缺，清辉永照人间。

编者按

欲图探索宪政民主的熊希龄，在时局中只能是个妥协者和失败者。袁世凯称帝初露端倪之时，熊希龄急流勇退，但他出力调停各方军阀势力战争、主张联邦制支持湖南制宪，积极参加各种社会讨论。当种种政治希望再次破灭，熊希龄对政治深恶痛绝，他还是没有隐遁于世，而是在连年天灾兵祸的时刻转向社会慈善，捐出全部家产，

9月1日，是开学的日子。这天，长沙市第六中学（兑泽中学）高一新生的“开学第一课”，邀请了湖南师范大学教授、《熊希龄传》作者周秋光。他以“熊希龄的慈善实践与当代回响”为主题，系统梳理熊希龄的人生轨迹，解读其从政、从善两次重要人生转向。

熊希龄（1870年—1937年）曾任兑泽中



长沙市第六中学老校门。通讯员 摄

一

一脉风传树已成

王旭

9月1日，晨光洒落，我坐在长沙市第六中学图书馆报告厅里，第十四期“慈善文化百人会讲”正式开幕。座无虚席的厅堂中，一种深沉的喜悦与感动在我心底悄然萌生。此情此景，让我蓦然忆起另一个特殊的日子——2023年6月19日，我校正式复挂“长沙市兑泽中学”校牌，在兑泽校史上落下厚重一笔。无论彼时还是此刻，一位民国总理的身影，总是隐隐约约、又无比亲切地，回到这方校园。

他就是熊希龄。

120年前，这所学校的诞生，便与“教育救国”四字紧紧相连。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，一群痛感国势衰颓的湘西旅省人士，虑及家乡青年求学无门，决意在长沙创办“湖南西路公学”，亦称“湘西公学”——那便是我们学校最初的雏形。1912年更名湖南第一公学，1914年曾短暂并入省立一中；但湘西教育界人士深知私立办学之必要，旋即于原址复校，正式定名“湖南私立兑泽中学”（以下简称兑泽中学）。“兑”在《易经》中为“泽”，雨露恩泽之泽。兑泽之名，取“悦动生命、丽泽成长”之要义。1925年，熊希龄先生担任董事长。一位在政治风浪中搏击大半生的人，愿将自己的名字与一所中学系在一起，足见他心里始终有一块柔软而坚实的地方留给了教育。他明白，有些事靠法令与权柄办不成，得靠一粒一粒种子，慢慢长。

翻阅故纸，查阅旧档，熊希龄先生的形象在我心中渐渐从名号化为一副血肉之躯。他24岁中进士，沿着

科举坦途一路向上，本以为可以凭才学报国。然而甲午年（1894年）的炮声从海上传来，把一个王朝最后的体面炸得粉碎，也把那一代读书人的心震得七零八落。他回到湖南投身维新，《湘报》上的文章一篇接一篇刺向守旧势力，他站在最前面，少年意气，几乎不知畏惧。变法失败，谭嗣同等六人血洒菜市口。他本在北上应诏之列，偏偏途中染了重病，耽搁十余日，因而幸存。病愈后闻知同道死讯，他心中的滋味，恐怕比死更难受。革职、看管、沉寂。

这段时间里，他处理西路师范讲习所校务、学务。后赵尔巽起用他，从屯垦到造币，他由书生磨成了务实练达的干才。1913年，他登上国务总理之位，与梁启超组阁，在大政宣言中提出整套改革设想，以为终于等到了施展抱负的时机。可历史对理想主义者向来吝啬，几经波折，他的政治生命被迫戛然而止。

然而，最令我感佩的，是他失去政治舞台之后的选择。

那时他已不年轻。“九一八”炮声响起，他带着妻子和女儿奔赴前线，在炮火中救援伤员、安置难民。他在北京香山北辛村为自己筑了一座生圻，特意写了一篇墓志，有“今当国难，巢覆椋崩，若不舍己，何以救群”之句。他将全部家产捐出，创立“熊朱义助儿童幸福基金社”，只给子女留下了一点。老友叶景葵后来叹他：“平生似遇而实未遇，欲有为而终不可为。”这评语里有惋惜，更有敬重；一个明知不可为而始终为之的人，远比顺风顺水的成功者更令人动容。

二

水秀，乃车胤故里，实为读书佳处。1938年春，初中三个班先迁新洲；冬，高中部迁至北倚嘉山、南望梁药山的鲁家坪。师生乘舟东来，于新洲登岸，在祠堂住了下来。高中教室设在村中三进祠堂，每进楹联皆为著名学者吴恭亨所撰，字字珠玑，透出一派悲壮而坚韧的西迁之路。8年三易校址，只为守护一点教育的希望。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，兑泽中学奉命疏散。彭锦云校长与同仁商议，决定将学校迁至常德津市附近的新洲。此地离津市仅7公里，交通便利，便于沅澧学子求学；更兼山清

水秀，乃车胤故里，实为读书佳处。1938年春，初中三个班先迁新洲；冬，高中部迁至北倚嘉山、南望梁药山的鲁家坪。师生乘舟东来，于新洲登岸，在祠堂住了下来。高中教室设在村中三进祠堂，每进楹联皆为著名学者吴恭亨所撰，字字珠玑，透出一派悲壮而坚韧的西迁之路。8年三易校址，只为守护一点教育的希望。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，兑泽中学奉命疏散。彭锦云校长与同仁商议，决定将学校迁至常德津市附近的新洲。此地离津市仅7公里，交通便利，便于沅澧学子求学；更兼山清

暑假期间，我们曾专程前往张家界，寻访田家大院旧址。

院子还在，青砖黛瓦、深庭重院，虽经修缮，旧时格局依稀可辨。站于此间，可想见那些从长沙一路西迁的少年轻晨的模样。学校一面教学，一面修校舍，并租水田数千亩开辟农学院。学生的课桌用木板和支架钉成，因陋就简；不久又建起一栋楼房，作为仪器室和图书室。尽管生活极度艰苦，且三次水转陆运，图书仪器损失不小，但学校精华得以保存，师生终于有了较为理想的安身之所。这段田家大院的岁月，物质匮乏，精神却无比富足。大院不仅为兑泽师生遮风挡雨，更用“诗书传家”的底蕴滋养了他们的灵魂。

每当我回溯这段西迁史，总被那份艰难困苦中依然坚守的教育初心所震撼。是怎样的信念，让师生们在温饱不保的战乱中发奋工作、努力学习？是怎样的力量，让图书仪器屡经水火仍被抢救，让“学校精华得以保存”？我想，这正是“公勇诚朴”精神最极致的体现——公心为国，勇毅前行，诚恳治学，朴实为人。教育在那时不仅是知识传承，更是民族精神的延续，是国家未来的希望火种。



熊希龄创办的香山慈幼院。（资料照片）



长沙市第六中学校园。

通讯员 摄